
论曾国藩的战术思想

李成甲 魏 均

以书生从戎的曾国藩,对于指控战阵素无经验,正如他在家书中所说:“至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①。然而经历了十多年的戎马生涯,曾国藩不断地总结与太平天国农民军作战的经验,并继承了中国古代优秀的兵法思想,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因地制宜,切中实际的战术思想,以之来对付太平军,最终完成了镇压太平天国的使命。因此,有必要对曾国藩战术思想加以概括、总结,以此来充实、完善我国丰富的兵法思想。

一、关于稳健中求变化的攻势防御战术原则

曾国荃在围攻江西重镇吉安时,曾国藩曾经为他写下了一幅对联,上联是“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②,后来这一句对联成为曾国藩和太平军作战的指导原则,不但在战略思想上,同时在具体战术上,也无一不体现这一原则。

太平天国起义后,势力很快就遍及长江流域,军力发展到五六十万人,占领了长江流域的许多重要城镇;而湘军编练成军后,兵力最初不过 1.7 万人,发展到最后也不过 12 万人左右,至于一个

①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662 页。

②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356 页。

统领所率人马一般只有五六千人,便须独当一面攻城略地。所以曾国藩的湘军和太平军相差悬殊,太平军往往是湘军的几倍,或几十倍。曾国藩在总结湘军岳州惨败的原因时指出,“其岳州城内王璞山有勇二千四百,朱石樵有六百,男(按指曾国藩自己)之营有一千七百,以为可保无虞矣,不谓璞山至羊楼司一败,而初十开仗,仅男三营与朱石樵之六百人,合不满二千人,而贼至三万之多,是以致败。此后不敢分散。然即合为一气,而我军仅五千人,贼尚多至六、七倍”^①。双方力量的对比悬殊,在湘军建立初期成为其多次失败的原因。那么如何才能在对太平天国的用兵中,以少数的军队既可攻取太平天国所占领的城池,收复失地,同时又尽量减少伤亡,保存实力呢?曾国藩往往采取“攻势防御”战术来解决这个矛盾。“攻势防御”也是曾国藩“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这一用兵原则因时制宜的具体运用。

在对太平天国作战的过程中,湘军为了收复失地,多采取攻势,即“以剿为堵”的战略进攻,这难免在战术上经常要攻打城池。正如曾国藩所认识的那样,“行军以能攻城略地剿灭大股者为上”^②。但若采用人力蛮攻蛮打的攻城方法,势必造成极大的伤亡并挫伤自己的锐气,而为曾国藩极力反对。他曾针对以人力蛮攻城池作了这样的评述:“攻城极无把握,扑勇者紧逼城根,往往被火药烧伤;浮滑者并未近城,自欺欺人,徒伤扑者,故余不肯为也”^③。他吸取古代兵法的经验指出:“攻城最忌蛮攻,兵法曰: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罪也,故仆屡次寄书,以蛮攻为戒”^④。曾国藩在总结了屡次失败的教训,吸收了中国古代攻城方法后指出:“用兵之道全军为上,保城池次之”^⑤,“此后不

①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248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3603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13849页。

④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13467页。

⑤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70页。

可再行蛮攻，坚垒须扼扎要地，贼所必争之区，致令贼来攻我，我亦坚壁不与之战。待其气疲力尽而后出而击之，自操胜算”^①。所以，扎营修垒，围而不攻，困死敌人成为曾国藩对付坚城的主要战术，而太平天国为了打破湘军的围攻，又往往在内线组织反攻，在外线用援兵破围，这样湘军又经常处在防御的地位，从而使自己的攻坚战变为进攻中的防御战，形成攻势防御的势态。

为了能首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达到围困太平军的目的，曾国藩对扎营修垒做了严格的规定。湘军每进攻到一座城下，统领首先根据利于作战的原则，选择地势险要的地方，扎营修垒，筑墙挖壕，正如曾国藩所指出的那样：“惟当酌择险要，固垒深沟，先立于不败之地”^②，“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③。我们从此不难体会曾国藩“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的原则，而扎营则成为这一战术的关键。

在扎营选址时，曾国藩十分慎重，他认为“扎营之地，忌低洼潮湿，水难泄出。忌坦地平洋，四面受敌。忌坐山太低，客山太高。忌斜坡半面，炮子易入”。“扎营之地，须择顶上宽平旁面陟峻者，择背山面水者，择砍柴挑水便益者”^④。更为曾国藩注意的是，扎营修垒不宜离所攻城池太近。曾国荃在围攻吉安城时，曾国藩多次写信告诫他：“围城之法，扎营不宜太近。一则开仗之势太蹙，一则军事尚隐尚诡，不宜使敌人丝毫毕知也”^⑤。他还曾说过，扎营离城太近有三个坏处，一是如果“地太逼，则贼匪偷营难于防范，奸细混入难于查察”；二是“节太短，则我军出队难于取势，各营同战难于分段”；

①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第16258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第16234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13429页。

④ 《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二。

⑤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41页。

三是“一经扎近之后,再行退远,则少馁士气,不如先远之为愈也。”^①而扎营离城远,则既能实现用兵稳妥的原则,又可在稳妥中求变化。即所谓善战者,必先能自固,而后才可以在营垒里静候敌人的间隙,突然发动攻击,以逸待劳,最终达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曾国藩把他这一战术思想总结为平生只会“结硬寨,打呆战”^②,但其实却是对付善于守城的太平军最稳健的战术。

体现“攻势防御”战术的“深沟高垒”,也是曾国藩经过湘军多次失败后总结出的作战方针。太平军西征湖南时,刚刚建立的湘军正准备扬帆远征,便在桑梓门前的岳州一败涂地,几乎使曾国藩羞愧自杀,而后他在总结失败教训时指出:“岳州之溃败,即系因未能扎营之故。”^③从此以后曾国藩在进攻城池时十分注重扎营,并收到明显成效。湘军攻打安庆时,鲍超、成大吉遵照这种战术,不到20天就把安庆集贤关外太平军最坚固的四个营垒全部攻破,1200人无一生还。曾国荃采用这一战术,经过一年零三个月占领了安庆,二年零二个月攻克了天京。论时间长短虽有不同,但都是通过这种稳健的攻势防御战术,把城池死死地困住,收功便是计定之事了。《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的作者呤喇就此评论说:“这种办法虽然历时长久,但是轻而易举的,毫不费力,用不着战斗就可以结束战争。”^④

二、关于以主待客以静制动的战术原则

古代军事家认为,善用兵者要善于灵活运用战场形势,以我为主,以静制动,变敌军为被动,达到“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目的。曾国藩从古代军事家的经验中得到启发,并在自己的战争实践中

①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47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五。

③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247页。

④ 见王维周译本,第12章。

对其进一步发挥和创新,逐渐形成了以主待客、以静制动的用兵原则,这也是曾国藩对他稳健中求变化的攻势防御战术的进一步发挥和补充。

攻势防御战术,虽能有效地围困敌人,达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的,但它避而不战,并不能主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因而还必须有一定的战术思想来指导围城的将士,从而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为此曾国藩在湘军围城中十分注重主客关系。在这里,“主”与“客”基本上是对应于“守”与“攻”的,一般以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者养逸而客者疲劳,主者后发制人,而客者先发制人。曾国藩在给罗伯宜的信中曾详细论述了他的“主客观”,说:“精锐百战之卒当加意爱惜之。宜使贼来寻我,我不去寻贼。仆于用兵深以主客二字为重,扑营则以营盘为主,扑者为客。野战则以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战地者为客。临阵则以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关于主与客的区别,他说:“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为主不喜作客”^①。这种主客原则运用到具体的围城战中,就是以静制动,以逸待劳。曾国藩指出:“凡贼来扑营须静守以待其饥懈”^②,一定要坚忍不出,凭墙坚守,避其锐气,等待敌人气衰力疲时,然后出战,攻其惰归,常可击败敌人。倘遇敌为主,我为客时,则必须反客为主,在敌人必争之地,坚筑营垒,挖掘长壕以围困之,使之不得来攻我营垒,遂反主为客,变主动为被动。因而曾国藩坚决反对越壕迎敌的战法,他在总结了安庆外围战经验后指出:凡湘军在安庆外围致败的原因“皆我去寻贼”所致^③。曾国藩又一再告诫湘军将领:“城贼猛扑,凭壕对击,坚忍不出,最为合法,凡扑人之墙,扑人之壕,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壕而应之,则反主为客,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13482、14355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第16233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13846页。

壕,则我常为主,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①

曾国藩以静制动,以主待客这一战术思想运用得最为巧妙的一战,是击败陈玉成二援安庆。是役的关键就在于我不先去寻敌,却要敌来寻我;到了敌来寻我时,我却千万不要出来应战,则我常为主,便可以操纵敌人,待机制敌,始终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正如曾国藩在战前估计的那样,“合围之后,狗逆(按:指陈玉成)不能不攻坚,不能不野战,然后多、鲍(按:即多隆阿、鲍超)可以缓急自由,彼求战而我不遽战,然后多、鲍可以取胜。”^②

在曾国藩看来,采用以主待客战术的益处,首先是以逸待劳,避敌锐气,蓄养自己的士气。曾国藩认为士气是战胜敌人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指出:“军中能成大事者,气为之也”^③,“用兵无他诀窍,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④。而蛮攻和浪战最能使士兵锐气受到损伤,故曾国藩反复强调必须力戒之。他认为:“凡打仗一鼓再鼓而人不动则气必衰减,凡攻垒一扑再扑而人不动则气必衰减”,待敌情毕露,形见势绌,然后必可得手^⑤。曾国藩有时为蓄养士兵锐气,使其长期保持新气,会放弃围攻敌城,缩地约守,以逸待劳。正如他给湘军将领林秀之的信中所说:“惟久顿坚城之下,士气日损,宜思所以抽掣之法,善退之道。军事以气为主,沦去旧气,乃能重生新气,若不改头换面,长守以坚壁,以日夜严防而不得少息,则积而为陈腐之气,如败血之不足以养身也,望两君子精心维持于十里之外求一善地,相机而退扎一步,养息此气,今日之善退正以为他日善进之地,君子之道一龙一蛇,岂拘于一格哉。”^⑥ 曾国藩又说:“凡用兵最重气势二字。此次弟(指曾国荃)以二万人驻于该处,太不得

①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84页。

②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693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13432页。

④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13459页。

⑤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14167页。

⑥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13478页。

势。兵勇之力须常留其有余，乃能养其锐气，缩地约守，亦所以蓄气也。”^①

其次，在于待变而起，视机而动，灵活地把握战争形势，始终掌握战争主动权，从而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曾国藩善于掌握以静制动的原则，将其灵活运用于具体战争中，使以静制动这一看来呆板、保守的战术里面隐藏着无限杀机。曾国藩从长期同太平军作战的经验中看到，有两种情况最难抵御，“一则以多人张虚声，红衣黄旗漫山弥谷，动辄二万、三四万不等。……一则以久战伺隙，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玩钝诡诈，揉来揉去，若生手遇之，或有破绽于伺则必乘隙而入，……二者皆难于拒御。”^② 曾国藩这一席话正道出了太平天国将领陈玉成、李秀成的用兵特点，要对付这样的对手，必须以静制动。待敌人来向我挑战时，我“以静心察之，冷眼窥之，无乘以躁气，无淆以众论，方能觑出可破之隙；若急于求效，杂以浮情，则或泰山当前而不克。”^③ “我官军切不可出队太早，须待各路之贼到齐，看明何路贼多，何路贼少，何路贼强，何路贼弱，何路为贼之正兵，何路为贼之伏兵，一一看清。待营中饱吃中饭后申酉之间天色将晚，贼匪久立气疲，头目欲战，众贼欲归，后出队击之必可获胜。”^④ 由于依靠以静制动的战术，故任凭陈玉成多么“善用兵”，多么会“使清军随其而动”，多么会“诱敌深入反客为主”，多么“善扎官军后路，杀回马枪”^⑤，曾国藩仍能抓住战争的主动权，调动太平军随其而动，从而最终达到以少胜多、后发制人的目的。

曾国藩一方面强调以静制动，另一方面又并不否认采取积极主动的进攻，必要时还必须冒一定的风险。曾国藩认为湘军不打则已，既出队就必须猛进猛追，“守则静守，不放一枪，不出一人；打则

①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67页。

②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37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13456页。

④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第16252页。

⑤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13854页。

猛打，出队不可太零，收队不可太快，出队见贼未开仗而轻收者，尤长贼气”^①。曾国藩针对湘军将领朱品隆作战不敢略冒风险，曾做过这样的批示：“我军平日宜戒浪战，若看定地势酌定时候，本有可打之机，却又不可太斯文了。一经得手，即须痛剿穷追。上午得手，下午又剿又追；先日得手，次日又剿又追，乃足以振军威而寒贼胆，不过猛打数次，三千余人即足抵万人之声威矣。若一味稳慎全不勇猛，交锋之际见贼小挫退，我亦得罢且罢，得收且收，不说天色将晚便说风雨将至，不说士卒饥疲便说出队太远，不说怕有埋伏便说另股包抄，如此则永无痛剿之时，贼亦永无吃亏之日，不过数次，贼必狎而玩之，三千余人只足抵千余人之声威矣。”^② 所以曾国藩指出：“打仗譬如治病，略施表散之方，而无猛攻之剂，则病终不能去……我军但审量敌，一有可乘之隙，即猛击猛杀猛追，使逆胆悉寒，不敢窥伺，庶可一劳永逸。不然株守以待贼至，稍胜而即收队，稳则稳矣，于贼毫无所损”^③。对于打仗敢冒一定风险的将领，曾国藩是非常赏识的，他说：“军威所以大振者全是打出来的，有四分是把握打的，有六分是冒险打的。从前楚军初立，塔军门（按：指塔齐布）有八分冒险，后来多、鲍有七分冒险，李忠武亦有六分冒险，近来各军专图十分把稳不肯冒一二分险，虽穷饿之贼，残败之贼，亦从不猛打痛追，以致穷蹙者不肯降，裹胁者不肯散。”^④ 可见曾国藩在指挥战争中把稳静和猛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灵活地运用于战争的指挥艺术当中，并没有把二者对立割裂开来，这也正体现出曾国藩“一求稳当，次求变化”的战术主导思想。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14105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第16332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第16335页。

④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第16336页。

三、关于奇兵正兵、呆兵活兵互用的战术原则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必须懂得根据形势,灵活地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军队,作到奇正互用变化莫测,从而出奇制胜。正如古代兵家孙子所言:“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①虽然曾国藩生平用兵总以稳健著称,但他在总结自己一生的用兵时,并不以稳健自得,且极力倡导用兵应变化无常,并对自己用兵过于呆板进行了反省。他说:“古人用兵,最贵变化不测。我生平用兵,失之太呆。”^②因此他教导其他将领用兵时要因势而变,不拘常规,要善于运用奇正互用的战术原则。曾国藩还在奇兵正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呆兵、活兵的概念,这无疑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兵法思想。

“奇正”,一般指军队的作战战术而言,按常规作战没有变化的军队为正兵,不按常规、变化无常的为奇兵。如两军相对正面交锋者为正兵,侧翼包抄为奇兵;明攻为正兵,偷袭为奇兵。曾国藩继承了中国古代这一奇正互用的思想。他指出:“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阻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别之,则用兵之道过半矣。”^③在曾国藩看来,奇兵一般是作为正兵的必要补充来发挥作用,所以奇兵人数不要太多,要行动快速敏捷,变换无常,这样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惟老营处孤危之地,则小队出奇之师。贵少不贵多,贵变

① 《孙子兵法》。

②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024页。

③ 《笔记·兵·杂著》,《曾文正公全集·诗文》。

不贵常。古人谓之狙击,明人谓之雕剿,设小队稍有疏失而老营仍一尘不惊,斯为尽善。老营则安如泰山,小队则动如脱兔”^①。

曾国藩一方面主张用兵要随机应变,奇正互用,另一方面又指出不可轻用奇兵,“平日非至稳之兵必不可轻用险着,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轻用奇谋。然则稳也、正也,人事之力行于平日者也;险也、奇也,天机之凑泊于临时者也。”^② 曾国藩虽然向将领十分推崇用兵要稳与险、正与奇机动变化,灵活运用,但谈至自己的战争经历时,也不得不承认:“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战,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③。但说到活兵、呆兵互用的战术思想,他则运用自如。

曾国藩在给曾国荃写的信中明确地阐述了他对活兵、呆兵的理解,他说:“弟在军已久,阅事颇多,以后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轻兵,少用重兵。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活兵也;屯宿一处,师老人顽,呆兵也;多用大炮辎重,文员太众,车船难齐,重兵也;器械轻灵,马驮辎重,不用车船轿夫,飘驰电击,轻兵也。”^④ 在曾国藩看来,大军屯扎于城池周围,长期和敌人相持,围攻敌人者为呆兵,而灵活机动,来去无定,变化无常,伺机消灭敌人者为活兵。我们不难看到这和曾国藩给奇兵正兵下的概念有某些相似之处,如他说:“屯宿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阻击者为奇兵。”^⑤ 可见,“呆兵”是曾国藩针对自己长期从事深沟高垒屯扎围城这种正兵形式的自我反省的一种表述,而活兵则是对灵活应变、快速反应、伺机打援的奇兵形式的肯定表述。所以呆兵和活兵是针对围城与打援而提出的两个概念,两种用兵形式,它只局限于围城与打援,并不象奇兵、正兵涵义那样广泛。曾国藩对太平天国

①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第16242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14153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五。

④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93页。

⑤ 《笔记·兵·杂著》,《曾文正公全集·诗文》。

总的战术原则是攻势防御,势必经常用重兵围困城池,围城长达一二年之久,而太平军为了解围经常派兵救援,一援不成二援,二援不成三援,正如曾国藩所说:“围城乃极大极难之事,岂可掉以轻心,若正真合围开掘长壕贼必致死于我,一援击退必再援,再援击退必三援”^①。因此湘军围城总挖前后两道壕沟,前壕抗击城中太平军突围,后壕抗击外援太平军,这在曾国藩看来过于呆板,而且太不可靠,破围的危险时刻存在。于是为了抗援,曾国藩常常抽出几支游击之兵即活兵,用来打援。这在曾国藩给胡林翼的信中说的非常明确:“楚军图皖须分两宗,一曰坚扼之师,一曰游击之师”^②。坚扼之师即围城之师——呆兵,游击之师即打援之师——活兵。因此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始终交织着呆兵与活兵、围城与打援两种战术。

曾国藩这一战术思想在安庆之战中运用得最为主动和灵活。他在围安庆时始终把曾国荃所统 1.4 万人用作呆兵掘壕筑垒,围扎在安庆外围;为了抗击陈玉成的援兵,又把李续宜、多隆阿部作为一支活兵用来打援,由于活兵过于单薄,曾国藩又准备了鲍超、成大吉两支活兵随时调往长江北岸安庆周围。这几支活兵的兵力达到 3 万多人。当陈玉成率部增援安庆解围时,几支活兵伺机包围陈玉成,打破了陈救援安庆的计划。而后,曾国藩始终在安庆上游保持着两支活兵,游击不定,随时阻击太平军派往安庆的援兵。正如他给曾国荃信中所说的:“余意以鲍军援剿瑞州、武宁、义宁,以成军(成大吉)还希公(李续宜)以谋黄州,或作北岸上游之活兵。希在北,鲍在南,上游有两支活兵,局势必振。”^③

湘军围攻天京之役则再次证明了呆兵围攻城池,活兵打击援军这一战术的效用。1862 年 5 月曾国荃率湘军两万人长驱直入,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 13794 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

③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 707 页。

孤军进扎天京城外,随后李秀成率几十万大军自苏州救援天京,对曾国荃实施反包围,攻打曾国荃营垒40多天。一向“善于各路策应,倏东倏西,风驰电掣,精锐莫当”^①,被用作活兵的鲍超,这时却在宁国被太平军围困,以致曾国藩抽不出一支活兵救援曾国荃。曾国荃虽依靠壕垒拼死抵抗李秀成的进攻,最终使李秀成放弃了对曾国荃的围攻,但此役险些使曾国荃全军覆没。其后曾国藩在总结这次作战的经验时指出:“此次大股援逆围扑官军营盘,苦守两月幸获击退,转危为安,亦自人事居半,天幸居半,此等至险之著岂可恃以为常哉?”^②在曾国藩看来,要想攻破天京,必须改变这种只用呆兵株守的战术,另设一支人数众多的活兵在外游击打援,呆活结合,才能可保无虑,因此他拒绝了曾国荃要求增兵围城的请求,指出“另换局面则可添营以资攻剿,目下株守之局则不可添”^③。同时他对曾国荃用兵太呆提出了批评,“古人用兵,最重变化不测四字,弟行军太少变化。”^④“望弟决从余计,分作两大支,一支呆兵,屯扎金陵;一支活兵,凡金柱、东坝、小丹阳、二溧、句容等处,听弟择地而驻,相机而进。有急则两支互相救应,去金陵总在二百里内外也。”^⑤“弟统三万人,不筹出一支结实可靠之活兵在外纵横驰击,而专以合围攻坚为念,似非善计。”^⑥在曾国藩再三督促下,曾国荃才抽出彭毓橘、刘连捷为两支活兵驰骋于天京周围,后来曾国藩又抽出鲍超一支为活兵,游弋于天京南路东坝、二溧之间,疏清了天京周围的太平军,并随时打击来自浙江方面的太平军援军。在曾国藩这种呆兵活兵、围城打援的战术思想指导下,曾国荃最终完成了对天京的合围,并且使天京城东南百里之内已无太平军踪迹,湘军

① 《中兴将帅别传》卷十一下,第127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第16295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第16295页。

④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94页。

⑤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87页。

⑥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981页。

也再没有在天京周围碰到太平军援军的有效进攻,天京便成为曾国藩的囊中之物了。

四、关于集中兵力,力戒分兵的原则

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在其《孙子兵法》中指出:善用兵者,“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曾国藩从孙子这一用兵原则得到深刻的启示,结合湘军兵力远远少于太平军的实际情况,在具体的作战过程中强调集中兵力,尽可能地避免分兵。他指出:“兵分则力单,将分则谋寡”^①,反复强调,“兵最怕分,分兵最易误事”^②。

曾国藩曾针对湘军统领张运兰打仗时经常分兵作战的弊病进行过批评:“阁下用兵事事可法,唯开仗时分支太散,队伍太少,如晨星之落落,不足以慑敌之胆,转足以长贼之气”^③。安庆之战的胜利,就是曾国藩坚持集中兵力这一战术原则的生动体现。在此战役中,曾国藩始终将安庆作为其战略的基本主攻方向,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是来自清廷调兵苏浙的命令还是武汉危机迫使其撤兵,以及皖南局势何等紧张,也决不分安庆之兵,而且还准备抽调更多的人马以加强安庆战场的兵力。在皖南局势稍安后,曾国藩便先后调遣朱云岩率 500 人,鲍超率精锐 8000 人北援安庆,这就在安庆战场周围形成了湘军的局部优势。虽然陈玉成采取攻其必救的战术,力图分安庆外围湘军兵力,但曾国藩指出:“贼思解安庆之围,各处窜扰,无非欲分我兵力耳。吾任凭各处糜烂仍不分安庆兵力,鲍军亦不调开矣。”^④

而与曾国藩相反,太平军则屡犯分兵的错误,最大的一次分兵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第 13545 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第 16294 页。

③ 《复张凯章》,《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八。

④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711 页。

是陈玉成、李秀成会攻武汉失约。本来按干王洪仁玕的西征计划，陈、李约期，集中兵力合取武汉，或许可以实现攻其必救，迫敌分兵以救安庆的计划。但陈、李失约没能达到集中兵力攻下武汉的目的，继而陈又在鄂北屡攻城池，并在德安、随州、蕲州等地留守三万余人，而自己虽急速回师救援安庆但兵力不足两万，兵分则力单，这和曾国藩、胡林翼迅速在皖北集中五万之众相比，明显是寡不敌众。湘军虽在总兵力上远不及太平军，但却在具体的战役上能够集中兵力，这成为曾国藩以少胜多，战胜太平军的重要原因。

五、坚持在审力基础上的虚实结合原则

曾国藩多次强调“审力”是在战争中取胜的必备条件。他说：“审机审势犹在其后，第一先贵审力。审力者，知己知彼之切实工夫也。……古人云兵骄必败，老子云两军相对哀者胜矣。不审力，则所谓骄也；审力而不自足，即老子之所谓哀也”^①。曾国藩把审力放在审机审势之前，可见他对孙子“知己知彼”这一原则的认识，是长期作战而得来的切身体会，绝非纸上谈兵。无怪乎每遇临战，曾国藩反复强调：将领指挥作战要“谋定后战”，“军事变幻无常，每当危疑震撼之际，愈当澄心定虑，不可失之太骤”^②。

“审力”也是曾国藩运用避实击虚、虚实结合这一战术原则的基础。对太平军、对自己，都要做到“审力”，但却要尽量做到不使太平军了解自己的底细，故曾国藩常常要求将领在审力的基础上，用兵作到虚虚实实，实虚结合，我尽窥敌之虚实，敌则不知我之深浅。他指出：“凡用兵之道本强而故示敌以弱者多胜，本弱而故示敌以强者多败，敌加于我，审量而后应之者多胜，漫无审量轻以兵力加

①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78页。

②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33页。

于敌者多败”^①。他又说：“兵法最忌形见势绌四字，常宜隐隐约约，虚虚实实，使贼不能尽窥我之底蕴。若人数单薄尤宜知此诀。若常扎一处力太单，日久则形见矣；我之形既尽被贼党觑破，则势绌矣，此大忌也。必须变动不测，时进时退，时虚时实，时示怯弱，时示强壮，有神龙矫变之状。”^② 曾国藩对我国古代兵法虚实结合这一原则的发挥，可谓淋漓尽致。

以上是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所采用的主要战术原则。这是曾国藩根据当时战争规模、战争形式，以及作战兵器的实际，总结了实际经验，继承了中国古代优秀兵法思想而逐步形成，并在作战过程中应用，为实践所证实了的正确的战术原则。这无疑是对我国兵法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虽然这一时期的战争，标志着中国古代以冷兵器为主要作战工具的战争的最后终结，但反映这一战争的曾国藩的战术思想对我们现代战争仍然有着很多借鉴之处。

（责任编辑：谢维）

（作者李成甲，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讲师；
魏均，西安通信学院政治教研室讲师）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14229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第16213页。